2014 年 4 月 21 日

责任编辑：张丹丹 E-mail:zhangdan2003731@tom.com 电话：010-62807315
758103815@qq.com

让机关真正成为为人民服务的机关

□张 俊

1923 年 1 月 23 日，列宁在病中口授了《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一文，提出了加强国家机关建设的一些设想。之后，列宁感到言犹未尽，又向秘书口授了《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进一步强调了改组工农检查院对改革国家机关的重要性，论述了改组国家机关和具体改组工农检察院的计划。该文载于 1923 年 3 月 4 日的《真理报》。《宁肯少些，但要好些》是目前已公开的列宁留下的最后一篇文献，与《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等另外 4 篇文章一起被称为“列宁的政治遗嘱”。

文中，列宁对了解到的国家机关现状十分不满，痛感要保证实现无产阶级追求的目标，必须采取根本的坚决的改革国家机关的措施。在对工农检察院的机关改革和建设问题进行剖析后，列宁强调在改善国家机关的问题上，不应当追求数量和急于求成，而要遵守一条准则：“宁肯数量少些，但要质量高些”。同时，列宁进一步指出：“要么不值得去做改组工农检察院这样一件没有希望的工作（这类改组我们已经进行过许多次），要么应当真正给自己确定一个任务，用缓慢、艰难和非常的办法，经过多次检查，来建立一个真正模范的、不只是由于官衔和职位才受到大家尊敬的机关”。

列宁的这些论述至今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也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分别在 1982 年、1988 年、1993 年、1998 年、2003 年、2008 年和 2013 年进行了七次规模较大的政府机构改革，改革的效果如何？我们都在机关工作，特别是中央国家机关，是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的地方，我们的机关是不是靠良好形象而不是“由于官衔和职位”才受到大家尊敬，在老百姓心中的形象究竟怎么样？

当前，社会上的一些议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群众对我们的看法：政出多门，推诿扯皮，龙多不治水，官僚作风，衙门作风，门难进，脸难看……虽然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初步建立，市场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经济发展的背后依然有一个“全能型政府”，特别是在地方，政府扮演着决策者、投资者、招商者、管理者、监督者等角色，行政管理体制一些深层次问题仍然存在：

一是纵向管理层次较多。新中国成立以来，除中央政府外，地方政府层级设置经历了多次调整，最终形成了目前两级制、三级制和四级制并存的局面。此外，市辖区、县级市之下设有街道办事处作为派出机关，少数省（自治区）在县之上设有地区（盟）作为派出机关，这些派出机关具有准行政层级地位，在事实上承担着一级政府的管理职能。因此，我国实际上是一个层级众多的国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数量巨大。

二是横向部门划分过细。1949 年，当时的政务院有 35 个部门，1956 年国务院组成部门上升为 81 个，1981 年达到顶峰，有 100 个部门。1982 年以来，经过七次政府机构改革，目前国务院组成部门减少到 27 个，但加上国务院直属机构、办事机构以及各类领导小组等协调议事机构，数量远不止这些。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对机关权力合理配置的研究还不够，机构改革有时显得比较匆忙，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考虑不周，或者难以推行，或者不够彻底，以至出现了膨胀—精简—再膨胀的现象。

三是职能交叉效率不高。一项决策要牵扯多个部门，协调困难，直接导致一些决策脱离实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统筹安排，以至于后遗症较多。比如，考大学名额少时，就扩招了之，还要把教育产业化，毕业找不到工作时，就鼓励支援西部等等，用的都是权宜之计，而非长久之计。老百姓一时一事“满意”了，到头来还是要骂娘。“三不管”地带众多，往往是有利益一起插手，无利益谁也不管。如不断有媒体报道，大到一个企业上千亿投资项目的审批，小到一个普通人的证件办理，当事者都有可能需要往返几十次，甚至为了一件小事也要盖几十个印章，历时长达数年。城乡、地区、部门利益严重固化，以行政审批为例，新一届政府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 200 多项，目前仍有约 1500 项，地方政府层面的审批项目则多达 1.7 万项。

四是“四风”问题还比较突出。官本位思想仍然严重，进而过渡到权力本位，追求行政级别，干部能上不能下，能官不能民，出现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个人化、个人利益法定化的怪圈。不少政府机关存在违法违纪现象，公信力下降。如通过这些年的审计发现，相当数量的部委存在违反财经纪律和其他方面规定的问题，老百姓对此意见很大，对党和政府确实出现了一些信任危机。

时间过去了九十多年，列宁当年指出的问题在我国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甚至呈蔓延之势，这要引起高度重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从根源上深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法治和高效政府，实现“小政府、大社会”。

我们相信，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审批事项的逐渐减少，我们的政府机构数量也会逐步减少，机构设置会更加紧凑和高效，真正实现少而精。机关就会成为“真正模范的、不只是由于官衔和职位才受到大家尊敬的机关”，成为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机关。

（作者系气象局党校班学员）

社会纵横

像焦裕禄 那样学习理论经典

□张大伟

焦裕禄有一句名言：“干劲不足的时候查思想，思想不通的时候就要加紧读毛主席的书。”他在临终前把女儿小梅叫到病床前，对她说：“你从我手里继承的只有党的事业，别的什么也没有……我留给你的，只有一部《毛泽东选集》。它会告诉你怎样工作，怎样生活，怎样做人。”这样的情结当前一些年轻人可能觉得很不可思议，其实它正是一代党员干部精神状态的生动写照。在 20 世纪六十年代，党组织在青年党、团员结婚时送一套理论经典很普遍，毛泽东在他女儿李讷结婚时就是送给她 39 卷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而后者则非常高兴地接受了。

理论经典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是哲学、是科学，为我们提供了正确和理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在到党校工作前曾为就业问题弄得焦头烂额，后来在不经意中得到一套“三基本”丛书（《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毛泽东思想基本问题》《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读了之后感到心神宁静下来。到党校工作后，我有计划地读完了《毛泽东选集》（1—4 卷）和《邓小平选集》（1—3 卷），感到学习经典原著和理论教材还很不一样，上课逐渐有了底气。当前各种社会思潮层出不穷，各类学员参加培训的想法也很不一样，稍有不慎你就会成为正邪不辨、盲目跟风的“墙头草”，没有一点理论经典底蕴是站不好三尺讲台的。其实在基层做群众工作也是这样，一些党员干部抱怨新形势下的“知识恐慌”“本领恐慌”，感到束手无策。其实，很多现实问题在理论经典中早就论述到了，而且指明了努力的方向，读了它之后就会让你拨云见日、豁然开朗。可惜一些基层干部遇到问题不去从理论经典中找方法，只是一味地从狭隘经验中找方法，甚至从“潜规则”“厚黑学”中找方法，这样偶尔也能耍点儿小聪明，但最终没有不走火入魔的。他们支离破碎地理解相关政策和上级指示，不能理直气壮地向群众解释问题，不能从根本上为群众解决问题，当然容易滋长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作风。

学习理论经典需要一些毅力和恒心，但最终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近几年来，我随着中青班考察了井冈山、瑞金、西柏坡等红色故地，除了增加了一些党史知识以外，对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锲而不舍学哲学、用哲学的勤奋精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曾说过：“我们学习马列经典，绝不是因为马克思、列宁是什么先哲，而是要从中找到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他那种忘我的学习劲头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从去年 3 月开始，我有计划地每天阅读一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 卷本）。由于自己工作忙，也由于内容生涩，我常常每天只能读几页，弄懂几段话、几句话的意思，但还是坚持了下来。有一次到外地出差，住同一房间的朋友见我带了一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忍不住大声惊叫起来，以为发现了出土文物。我嘴上没说什么，心中暗暗想：“当一个和尚要读一点佛经，当一个基督教徒要读一点圣经，如果一个党校人不去钻研一点马列理论经典，一个党员干部对马列理论经典如此陌生冷漠，这不也是咄咄怪事吗？”

所幸的是，很多党员干部随着职位的升迁、阅历的增长，逐步意识到了理论经典的重要价值。学习理论经典绝不是倡导教条主义，恰恰是教会你如何辨别理论教条和工作实践的关系。没有理论指导的基层调研是片面的、肤浅的。对于干部来说，“思维方法”比“领导艺术”要重要得多。近几年来，我校举办了几次处级干部学习马列理论经典培训班，每次报名都非常火爆。今年初，我校连着举办了三期处级干部学习习近平战略思想培训班，课堂秩序都很好，大家听得很认真。在清明节前夕，我打开“焦裕禄纪念馆”的网页，深入学习了焦裕禄的生平事迹，在感动之余，又增添了几分敬佩。焦裕禄家境贫寒，小时候只读过几年书，但在革命生涯中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学习理论经典，并在群众工作不断实践理论经典，最终出色完成了党交派给他的光荣任务，成为永远受到群众爱戴的优秀基层干部。今天，我们的学历水平、理解能力都要比焦裕禄高得多，面临的群众问题也比焦裕禄那个时代复杂得多，又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地学习党的理论经典呢？

（作者单位：上海松江区委党校）

不争者的竞争力

□赵迎辉

面对人生的种种机会和挑战，如职务的升迁、岗位的评聘、利益的获取、境遇的改变等，是努力争取还是顺其自然，不同的人往往会有不同的选择。有的人使出浑身解数，造声势、抢风头，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哪怕撞得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有的人则从不勉强行事，一心一意做好分内之事，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无论结果如何都坦然面对。对于前者，只要竞争手段正当，我们就无可厚非。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自然界也包括我们人类生存的共同法则。纵使当今社会早已迈入文明时代，不再是弱肉强食、你死我活，但是面对成功的吸引和利益的诱惑，要想真正做到处之泰然、宠辱不惊谈何容易。对于后者，我们更应尊重，这种超越世俗、因任自然、“不争而善胜”“后其身而身先”的境界不是轻易就能达到的。其实所谓的争与不争，在目标定位上并无二致，只是处世哲学不同而已，争是一种直截了当的态度，不争则是一种留有余地的方式。到底孰优孰劣、孰是孰非，很难给出一个定论。但毋庸置疑的是，现实生活当中，不留任何余地的争者未必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有时甚至还会一败涂地，而“不敢为天下先”的不争者却往往能够凭着厚积薄发之势成为最后的赢家。不争者的竞争力，究竟来自何处？

思维理性，不争者看待问题往往具有长远眼光和独到见解。不争者，精华内敛，沉稳似水，内心超脱，自在宁静，在现实和世俗面前始终保持自己独立自主的意志和自由思考的能力，并能提出不落俗套的见解。观察问题分析问题思维缜密、长于思辨，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较常人更胜一筹。能够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抓住问题的核心，揭露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能够在众声喧哗中保持清醒的头脑，排除外界的干扰和影响，从而做出理智正确的判断。

谦让宽容，在成就别人的同时成就自己。“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不争者，胸襟开阔，谦下自处，不争名夺利，不斤斤计较，甚至甘愿“处众人之所恶”，凡事注意考虑别人的感受和处境，为别人的发展留出空间和余地，在成就别人的同时往往也成就自己。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和鲍叔牙是很好的朋友。年轻时二人合伙做生意，鲍叔牙出资多，管仲出资少，可赚钱后，管仲却比鲍叔牙拿得多。鲍叔牙的仆人颇有微词，鲍叔牙却说：“管仲家里穷，又要奉养母亲，多拿一点没有关系。”后来，鲍叔牙辅佐的公子小白成为齐国国君（齐桓公），鲍叔牙向小白推荐曾经三射小白的管仲来做宰相。小白最终采纳了鲍叔牙的建议，并在管仲的辅佐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鲍叔牙以不争之德，不仅成就了管仲的才干，也成就了自己的美名，更成就了齐国的伟业。老子云“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帮助别人、给予别人的越多，自己得到的也就越多。

善于自省，能够不断吸取经验教训。苏格拉底认为：“未经自省的生命不值得存在”。不争者，不骄不躁，沉稳持重，既不居功自傲，也不急于求成。始终保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努力做到“吾日三省吾身”，注意倾听别人的意见和建议，经常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深入剖析和认真反思，并及时纠正缺点和错误，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和综合素质，在自省中获取前进的力量，最终超越自我，破茧为蝶。

勤勉务实，造就不争者最大的竞争力。不争并不是消极退让、不思进取，也不是软弱无能、无所作为，更不是守株待兔、坐享其成，把自己的成功建立在别人的失败之上。而是以不争为争，以无为而为。不争者，不急功近利，不螳臂当车，而是把注意力放在有价值的思考和有成效的工作当中，稳扎稳打、默默耕耘正是不争者最大的竞争力。以投机取巧争、以旁门左道争，或许能够争得一时，但不可能争得一世，实力才是真正的杀手锏。正如老子所云“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不争不是心机，不是治术，更不是权谋，而是一种返璞归真的生活态度，一种进退有度的人生哲学，一种通达包容的处世智慧，一种超脱于当下的勇气，是“天下莫能与之争”的符合天道之“争”，经常有着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没有高谈阔论，只有一声不响；没有虚张声势，只有淡定从容。顺其自然，不勉强从事；以退为进，不苛求自己，这样反而能“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达到最佳的效果。若把不争当作手段，处心积虑，精心算计，就会掉入过度设计的泥淖，从而背离不争的本意和实质，最终与我们的初衷南辕北辙。

（作者单位：山东省委党校）

随 笔

中产阶层社会态度积极化的可贵探索

——评《中国当代中产阶层的社会态度（1978—2012）》

□冯必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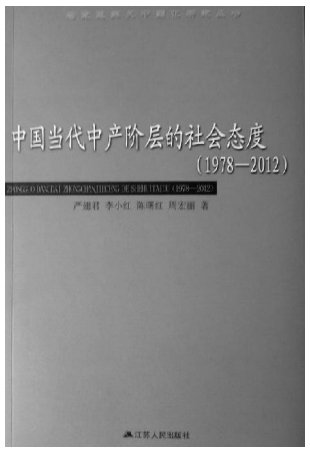
开始迈进中等收入阶段的中国，中产阶层的社会态度无疑对全社会社会态度的影响、对于国家发展举足轻重。所以，研究中产阶层社会态度积极化在当下中国就显得尤为紧迫而意义重大。江苏省委党校严翅君等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为基础写成的《中国当代中产阶层的社会态度（1978—2012）》（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3 年出版）一书，对此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得出了新颖独到的理论成果。

第一，从历史变迁的趋势中把握中产阶层社会态度的积极化。该书认为我国中产阶层诞生于改革开放，并伴随改革开放的进程而成长，中产阶层社会态度积极化也产生于这一历史变迁之中。书中对改革开放后社会急骤变化中的中产阶层社会态度的变迁过程进行全景式的描述：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经历了从“政治前卫”，到“政治后卫”，再到“超越政治后卫”的变化过程；其消费态度变化过程表现为：从崇尚节俭的主色调，转向“能挣会花”、追求时尚和符号消费，走向地位标签的转换、低碳消费偏好有所抬头；其文化态度展现出一种充满张力的延异流变图景：从文化认同与困惑的胶着，转向“文化媚俗”与“文化尚雅”的纠结，再走向文化态度的扬弃与范式重塑。中产阶层社会态度积极化正是这种变迁的总体趋势。

第二，对中产阶层社会态度积极化功能价值的合理定位。该书对中产阶层社会态度积极化的功能价值作了全方位的考察，认为其承载着社会活力的激发功能、社会和谐的稳定功能、社会习俗更新的催化功能、民主政治生活的建设功能。作者认为中国中产阶层主体构成与变动区别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一开始就呈现工商业创业者、小型资产拥有者、知识劳动者为特征的雇佣劳动者等各种内涵相叠加的图景，而随着中国工业化转型晚期的到来，其构成日益走向以知识劳动者为主体。这一社会群体社会态度的积极化，非常有利于社会发展活力的激发。而在社会和谐稳定的维系方面，目前虽然还不足以形成“橄榄型”社会中中产阶层社会态度作为社会稳定“压舱石”的功能，但是，中产阶层以其自组织能力相对发育较强的特点为全社会注入组织理性和管理理性，同时以其声望和能力形成影响社会的“波纹效应”，如此等等。该书提示人们：世界经验表明，中产阶层社会态度的消极化、负面化，可能成为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沉重包袱和难以化解的社会销蚀剂。

第三，要加强中产阶层社会态度积极化的培育。该书认为在当下中国，中产阶层社会态度积极化不是“完成时”，仍是“进行时”，如果我们的体制机制不进一步改革，社会环境不进一步优化，仍然存在“倒退”的风险。正是基于这样认识，该书不仅仅以对事实的透辟观察和解读为满足，而时时以对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社会态度积极化的培育为己任。

该书认为要加强中产阶层社会态度积极化的培育，首先应该壮大中产阶层队伍。要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进一步做大蛋糕，不断提高全民的收入水平，使更多的人进入中产阶层；其次，要“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公平包括“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我们只有努力实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才能营造出公平的社会环境。唯此，才能强化中产阶层社会态度的积极化。最后，需要有良好的思想舆论环境。尤其是在现代传媒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下环境中，中产阶层一开始就是网络舆论场中的重要角色，并在这一舆论场的交流互动中不断地选择、重构自己的态度取向。因此，营造中产阶层社会态度积极化的良性思想舆论环境，是一个值得认真探索的问题。



（作者单位：江苏省委党校）

书 评



福建省委党校校园

校园风光

刊址：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 电话：(010)62805132 邮政编码：100091 订价：全年 88 元 订阅：本报发行部 发行部电话：62806227 照排：学习时报社 承印：人民日报印刷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字 0301 号